

特区经济概论

胡大钺 著
周敏

同济大学出版社

特 区 经 济 概 论

胡大钺 著
周 敏

同济大学出版社

(沪) 204号

特 区 经 济 概 论

胡大钺 著
周 敏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江西省宜春资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34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1-2000 册 定价:15.00 元

ISBN 7-5608-1130-1480-2/F·145

内 容 提 要

自从经济特区创建以来,就遇到许多过去没有想过也没有实践过的新问题,它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本书就一些特区建设的热点问题,诸如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特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特区的地位与作用;特区所有制结构改革;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区产业结构调整;特区金融体制改革;特区的战略目标和策略选择;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深圳特区与香港的对接,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等等,作了初步探索。

序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它博大精深,以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推动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经济特区先后问世,五颗灿烂耀眼的新星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一场跨世纪的伟大试验在神奇的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15年建设,15年创业,15年试验,15年飞跃。昔日的边陲小镇和海防要地,成了今日中国的“阳光”地带,令世人瞩目的生长极。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的力量还在于它将指引中国人民,夺取21世纪更大的胜利!

本书在孕育和诞生过程中,得到深圳市宝安石油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该公司总经理秘书王绍安同志的全力相助。特别感谢深圳大学出版中心苏卫平老师、同济大学洪建华老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由胡大钺撰写第1、2、4、5、6、7、8章;由周敏撰写第3、9、10、11章。

因水平有限,仓促上阵,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赐教。

作 者

1995年12月于深圳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特区是时代的产物	(1)
第一节 深圳经济特区产生的背景.....	(1)
第二节 特区初期的改革与建设	(16)
第二章 经济特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33)
第一节 经济特区的功能和作用	(33)
第二节 特区大力拓展经济、技术、文化、信息交流.....	(41)
第三节 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	(48)
第三章 经济特区所有制结构	(61)
第一节 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	(61)
第二节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71)
第四章 特区的产业结构与企业改革	(77)
第一节 调整产业结构	(77)
第二节 深化企业改革	(85)
第三节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创汇农业	(97)
第四节 依靠全国,服务全国	(104)
第五章 经济特区的第三产业	(111)
第一节 朝阳产业——旅游业的发展.....	(112)
第二节 交通邮电业的发展及前景.....	(114)
第三节 信息咨询业的发展.....	(117)
第四节 文教卫体和科学技术事业.....	(121)

第一章 经济特区是时代的产物

第一节 深圳经济特区产生的背景

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试验的英明决策。它的诞生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开创性的意义，它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探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正如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社会主义新型制度的基础一样，创办经济特区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活力。经济特区虽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走了短短的15年时间，但它所产生的辐射作用和巨大影响已引起世人的瞩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①

199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创建十周年前夕，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高声赞美道：“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有希望，才能推动中国的成功。”

一、深圳经济特区产生的国际背景

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经济国际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并行发展，特别是区域性经济合作已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大小经济集团和自由贸易区已有二十多个。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9页。

两种趋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区域集团对内实行不同程度的统一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一体化也起积极推动作用。但同时，区域集团应注意避免对外实行带歧视性的政策，防止贸易保护倾向，以免影响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①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的纽带作用。脱离了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轨道，各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就会逐步萎缩、枯竭和丧失。中国要走向世界，广东、深圳经济要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地区的水平，自然会遇到来自国外境外的严峻挑战。可以说，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1. 国际一体化的背景

国际一体化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潮流近些年来正在高涨。主要表现在：

(1) 西方大公司、大银行在世界范围内无国界地扩张，日益发展成全球性公司，这些公司和它们的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已占经合组织国家之间总贸易的一半多。

(2) 商品、资本、人员、信息、技术等大量而迅速地在全球流动，它们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其结果是即使像法国那样注重保护本国工业的国家，其市场被外国工业品占据的份额也已从 70 年代初的 16% 上升到 80 年代末的将近 30%。在美国申报的专利中，本国公司和公民所占的比重已从 1980 年的大约 2/3 下降到 1990 年的 1/2。

(3) 国际协调加强，包括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西方七国首脑的定期协商，通过国际垄断同盟对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经济活动、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的干预与调节。

^① 1993 年 7 月 7 日《深圳特区报》。

(4) 国际一体化扩大和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一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已经越来越无法脱离所处的国际环境。不论何种经济制度的国家，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都需要跨越国际市场这座别无选择的桥梁。

显然，经济要振兴，国家要腾飞，必须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当历史的时针指向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时候，这种来自世界大环境的挑战已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国领导层的面前。抓住时机，迎接挑战，就能够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地位。否则，贫穷和落后将会使国家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2. 区域集团化的背景

80 年代以来，区域集团化潮流席卷全球。它无论是采取欧洲共同体式的体制性的（有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北美式的半体制性的（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机制）还是东亚式的非体制性的（首先通过加强发展种种经济联系）、形式，其基础都是圈内国家有颇大的共同利益。这种发展趋势使各国都面临战略、竞争和壁垒三重挑战。所谓战略方面的挑战，是指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在已经大大改变的世界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所谓竞争方面的挑战，包括总体力量和局部优势方面的竞争，彼此打入和相互影响能力方面的竞争以及效率、质量和创新方面的竞争；所谓壁垒方面的挑战，是指区域集团化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会给被排斥在外的国家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区域集团大潮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是自然的事情。

3. 国际资金的背景

本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国际资金供给和需求会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资金供给跟不上需要的增长，因此，将出现国际资金趋紧状况。据日本经济中心的一项预测说，假定世界储蓄率维持目前状况不变，那么到 2010 年世界资金不足额将占世界国民生

产总值的 1.9%，为 1.8 万亿美元。另据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预测，到 2010 年世界资金短缺可能高达 2.8 万亿美元。造成国际资金短缺的根本原因是资金供求严重失衡，需要大大超过供给。其主要表现是：

(1) 世界三大资金供应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输出资金能力相对减弱。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美国已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据估计，到 2000 年美国的净外债将达到 1 万亿美元。日本由于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供给者。然而，随着日本内需扩大，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日本对外资金供应能力也将削弱。德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资本供应大户，但是自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支援东部重建，每年财政支出高达 1500 亿马克（约合 1000 亿美元）。到 2005 年，德国政府需要向东部地区投入 2.4 万亿马克（约合 1.5 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德国本身是无法满足的，它势必转向国际市场寻找资金来源。有人预测，90 年代德国将从资本输出国变成资本借贷国。

(2) 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多。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较大增长，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工业化的艰巨任务，需要巨额资金支援。据估计，到 2000 年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联合国规定的工业化目标，仅对创造业的投资每年就需要 4500—5000 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需要从国外引进。为了争取外资流入，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采取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放宽外资政策，并拟定了新的外资法案，允许外资进入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使进入印尼的外资猛增，在东南亚各国处于领先地位。印尼国内投资总额中外资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对即将起飞的印尼经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 国际资金主要流向投资条件较好的国家。国际资金趋紧，

争夺资金的竞争剧烈，这是指一般趋势而言。实际上，国际资金短缺对那些有能力吸引外资的国家来说，可用的资金仍然不少。因为资本按其本性总是流向能带来最大收益的地方。只是在投资条件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争夺有限资金的竞争才变得激烈起来。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不管未来国际资金如何短缺，竞争如何激烈，只要我们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比别国更优越的投资条件，再少的资金也会流进来。

4. 国际资源的背景

从资源方面来看，世界经济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是越来越严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新的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地球上极其遥远地方运来的原料。并且，它们出产的制造品已经不只是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是供世界各处消费。”^①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是很不公平的，有的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有的国家资源则非常贫乏。根据欧洲共同体的一份报告（此报告不包括中国的资料），世界现在已经探明的矿产原料，大约有44%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其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四个国家的矿产，又占整个发达国家的90%，即这四个国家占全球矿产的40%；原东欧、苏联占全世界资源的23%，且又集中于原苏联。发展中国家占全世界资源的33%，主要集中于巴西、智利、印尼、扎伊尔、几内亚和印度6国。上述11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苏联加上发展中六国占全世界矿产的80%，其余150多个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就得进口。所以原料依赖是客观存在的。以石油为例，全世界除了美、苏、英三个国家，加上石油输出国13个国家，这16个国家要占全球石油生产的88%。试问，哪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不要人家的资源？西欧75%的原料靠进口，日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1972年1月版，第12页。

90%的原料要进口，不靠其他国家怎么办？中国是个资源大国，许多矿藏资源号称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又是个资源小国，像水、可耕地、某些矿产资源却又极其贫乏。深圳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显然，不开放、不引进、不依赖别国的原材料肯定不行。

5. 国际市场的背景

战后世界贸易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后，各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各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加深。据联合国统计的材料，1970年世界出口贸易额3100亿美元，到1981年是21527亿美元，去掉物价因素，每年平均增长9%。同时期法国、美国、联邦德国的出口贸易额均每年分别增长7%、8%、9%；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2%、12%、10.5%。现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对外贸易占24%，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天下之宝一为我用，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哪个国家的产品便宜就买那个国家的，哪个国家的产品货色好就买那个国家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尽管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外贸增长还是比经济增长来得快。

6. 国际科技的背景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场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包括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即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日益缩短，从19世纪的50年，到当代的3—5年。科学技术在生产增长因素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已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到70年代的60%—80%。科学技术已成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据科学家预测，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科学技术在一系列领域，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三大技术方面，将出现突破性进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促进生产力更迅猛的发展，促进人类生

产、生活、思维等各个领域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在即将到来的更伟大的 21 世纪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因而，目前世界各国，包括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和部署了相应的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规划，有的甚至提出“科技立国”口号，把大力发展科技作为基本国策。在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与人民生存的关键时刻，中国领导层深刻认识到了时代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本着强国富民的发展方针，及时捕捉国际经济信息，尽快吸收消化当代世界科技进步成果，不断壮大经济实力，提高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这样，创办经济特区成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的首先方案，也就促成了经济特区在中国土地上的相继出现。

7. 国际竞争的背景

当世界历史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国家之间的实力角逐达到空前炽热化的程度。资本投资作为连接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纽带之一也日趋活跃，金融交易远远超过了商品劳务交易量，对资金的争夺构成了市场竞争和实力较量的核心与焦点。仅以日美关系中经济矛盾日益突出为例，它不仅表现在许多具体经济领域的摩擦，而且还表现在对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争夺上。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对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争夺中，日本“正在悄悄地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伙伴。”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在直接投资方面，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最大投资国。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额超过美国，占有所有外国直接投资额的 50%；

(2) 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日本超过美国而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在过去十年中，日本每年对亚洲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份额占 60%，而美国的份额只占 10% 左右；

(3)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日本已同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亚太地区商品日益重要的吸收地。日本对“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进出口额 80 年代成倍增长，同美国的贸易额基本持平。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行被称为“雁行模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即在亚洲地区经济、科技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每个时期，都由日本充当“领头雁”，紧随其后的是“四小龙”、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这一类似“雁行”队列中，日本通过投资、经援、贸易等途径，不断加强它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

针对日本“雁行模式”的挑战，美国政府提出美国介入太平洋地区的“扇形结构”。华盛顿把美国对太平洋的介入喻为一把打开的扇子，基轴在美国，向西辐射，扇子的骨干线是美日同盟，位于骨干线两侧的 3 条射线，分别由美国与韩国、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联盟构成；而以亚太经济合作的共同利益为纤维组织，将美国与亚太地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国际舆论认为，美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日本凭借经济实力把它排挤在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之外，力图使美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保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日美的激烈竞争只是国际竞争的一个缩影。世界经济竞争既是资源与财富的竞争，也是市场的竞争，更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让我们在国际竞争的惊涛骇浪中搏击，争得我们应有的一席之地。

二、深圳经济特区产生的国内背景

正当世界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程度发展的时候，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开始了拨乱反正、兴利除弊的工作重心转移。从此，新中国终于告别了昨日的深重灾难，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1. 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真正起步。这次会议既明确了新时期国家工作重心与战略重点，又制定了未来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对长远经济发展做了初步的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纪元，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召开意味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开端。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前进，中国经济必将走出困境，向振兴和腾飞的目标迈进。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是符合国情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没有这次会议，就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形成，也不会在80年代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更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全新观念的经济特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特区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特定历史产物。

改革是为了消除旧体制的弊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从我国实践看，改革的必要性在于原有体制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一种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妨碍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主要表现是：在计划管理方面，直接计划的比重过大，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过多；在工业管理方面，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过多，管得过死，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分配方面，平均主义严重，劳动用工形式单一，并形成“铁饭碗”的劳动制度，对职工工资，企业除了执行中央统一规定的升级面和增长幅度外，没有一点自主权。由于经济体制僵化，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经济效益，集中表现在投入多，产出少；生产增长快，人民生活改善慢。总之，旧体制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在贯彻改革开放这一完整的系统构想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改革开放深度和最能取得改革开放效益的经济特区便成为实现这一整体战略构思的最佳形式，于是深圳特区就成

为向旧体制发起冲击的排头兵。

改革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生产物质资料的现实力量，是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制度，而且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表现在能够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创造出更多的可供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革，都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

由于改革开放是一场全新的革命，一部分受旧体制严重束缚的人，在改革开放中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①在我们谈特区产生的背景时，12年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的这一段当属后话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而且斗争相当尖锐。

实行对外开放既是经济特区产生的背景，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越出一国的界限，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共产党宣言》指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